

▼
NEW HUMANITIES SERIES

新人文丛书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曲
辉

遥远的近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NEW HUMANITIES SERIES
新人文丛书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曲
辉

遥远的近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近代 / 曲辉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94-3093-1

I . ①遥… II . ①曲… III . ①中国历史—近代
史—研究 IV .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2474号

遥远的近代

YAOYUAN DE JINDAI

著 者: 曲 辉

责任编辑: 王 娟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糖晶书装 责任印制: 曹 靖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 100050

电 话: 010-67078231(咨询), 010-63131930(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wj_gm2013@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55×230mm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3093-1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立诚 尤西林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吴祚来 张 柠 李雪涛

汪民安 邵 建 陈晓明 单 纯 金惠敏

赵 强 骆 爽 夏可君 敬文东 谢 刚

谢 泳 黑 马 熊培云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刘夕海

刘永祥 孙德辉 曲 辉 张 铁 张卫平

张常年 李志强 邹建成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姝明 赵晓辉 秦志勇 袁本文

铁 军 鞠洪深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中国与世界，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激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

【总序】 本书于2003年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已再版多次，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惨痛而片面的集体记忆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尚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及其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所

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的尊严，唤起内心的力量，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特地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目录

总论：惨痛而片面的集体记忆

既往的辉煌	001
没落在近代	002
东西夹击	004
仓促地激进	005
一切向前看	007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中国	010
战争的到来	016
战争的过程	018
战争的结果	022
第二次鸦片战争	024

太平天国运动

会党	034
土客冲突	035
创教	038
发展	041
南京	045
转折	049
后期	055
陨落	060

洋务运动

重新认识世界	067
挣扎的拓进	068
洋务实绩	073
洋务运动的影响	078

戊戌变法

知识分子的惊醒	082
康有为与严复	083
严复	090
公车上书	097
百日维新	100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缘起	117
民间社会对西方入侵的反应	118
义和团最初的活动	126
清政府的态度和列强的反应	129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	132
列强武力干涉	138
南北情结与东南互保	143
中外压力下的互保	147
东南互保的另一面	149

清末新政

新政的开启与推行	158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161
立宪之路的开端	167
官制改革	172
立宪派的活动	177
后慈禧光绪时代与皇族内阁	186

辛亥革命

孤独的革命家	195
革命力量的联合	201
武昌首义	205
民国的诞生	215

总论：惨痛而片面的集体记忆

既往的辉煌

说起历史，身为中国人总是自豪的感觉居多，华夏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骄傲的东西。从大的方面说，中华文明位列四大文明之一，并且是这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发生断裂的；从小的方面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无一不可作为研究玩味之道，不但能从中发展出文化而且给人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愉悦。不仅如此，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是伟大的存在。

论政治，中国千年来的君主集权与乡绅自治相结合，使社会结构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虽然也有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的状况发生，但从未发生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纠缠不清的状况，也从未进入过长期的“黑暗时代”，世俗社会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论经济，中国从汉代开始，由朝廷以政治指导的方式鲜明地提出“重农抑商”的国策，从此农业特别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虽然小农经济分散经营无法使国家的综合实力获得飞跃式的提升，但纵观中国人口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口始终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这一

点正可证明小农经济的成功。直至鸦片战争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中国经济的辉煌；

论军事，我们更是可以举出众多成就斐然的军事理论家和功勋卓著的战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完成要远远早于西方军事理论经典——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而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开疆裂土的将军更是多如繁星。直至蒙元时期，中国在对外作战中更是取得了惊人的战绩，直打到欧洲的多瑙河。时至今日，提到中国古代的军事成就，很多人还是热血沸腾；

论文化，更是成就卓著、辐射久远。自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就产生了历史记载和对占卜的纪录。此后，文化名人大批涌现，春秋战国、魏晋、宋明等时期更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诞生了众多的经典著作和著名学者。翻开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等著作，里面如光荣榜般罗列的众多人名，让我们应接不暇。同时，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吸纳、转化别种文化的能力超强，佛教中国化而产生禅宗就是一个显例。传统上，我们一直以“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和正统，但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最为明显的是“五胡乱华”时期和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时期。然而，这些时期并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大的破坏，反而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这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吸收融合能力；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则验证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到了晚清及近代的时候，中国会遭遇到严重的挫折呢？

没落在近代

中国近代的问题不始于近代。如日中天之时，正是日薄西山之日，中国政治体制至唐代基本达到完备成熟的状态，此后则君主集权的趋势日益严重，至明代废除宰相、清沿明制又增设军机处，皇帝大权独揽，国家的

命运往往取决于皇帝一人的贤否，至此国家危矣；经济上，明代虽沿袭重农抑商的传统甚至时而闭关锁国，但锁而不严，不但沿海贸易时有发生，内陆的徽商、浙商等也日益崛起，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明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清代则“片板不许入海”，很长时间内只留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贸易额直线下降。国内商品经济的状况也令人担忧，比之明朝只有倒退；军事上，冷兵器时代称雄的唐刀虽已失传，但明代火器的使用逐渐普遍，甚至进口改进版的红夷大炮也用于战争，但清人以弓马取天下，轻视火器，以致雅克萨之战中，康熙调集内地大量部队辅以东北精锐八旗两万人围困800余哥萨克骑兵数月不下。军事之劣，可见一斑；文化上，历代帝王向来对学术采取“利用”的态度，向来掌握的是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治统”，对于学术传承的“学统”则多放手与学界。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巅峰，宋代士大夫以“孔孟之道”行“修己治人”之学的理想也得到了宋代皇帝的支持。明代皇帝多昏庸，于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学者采取“觉民行道”的方式，发起底层运动，致力于使一般群众掌握内心之理，从而共入圣贤境界。但清代时，以康熙皇帝为发端，虽表面上对孔子礼敬有加，而实际上却要身兼“治统”与“道统”，将天下之“势”与“理”都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一时之间，“道统”成为禁脔，不得已，清代学者多埋首故纸堆，翻检旧材料，以考据小学代替了经世致用之学。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可不变、不得不变的节点。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近代面临的外部环境又是如此之差。如众所知，现今的西方世界虽然以民主、自由、平等等理念为共同价值，但西方历史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期。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的价值才重新被发掘出来并逐渐成为共识和常识。但中国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对西方世界的重大变化毫无知觉，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人倚仗坚船利炮横行世界的时候，中国的大门才被动的打开。所以，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是帝国主义丛林时期，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特点就是弱肉强食。中国处于弱势的一方，长期被人欺压。更为不幸的是，当中国人在帝国主义的“大鞭

子”抽打之下，还未觉醒之时，我们的东邻日本觉醒了，他们奉行西学，实行明治维新。但日本奉行的是军国主义，实行的是对外侵略的国策，面对中国这样大的一块“肥肉”，自然不会不动心。所以，中国近代的历次改革是被一次次丧权辱国的危机推动着、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的；中国人对近代的记忆也是一次次挨打、一段段屈辱的历史记忆。

东西夹击

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历史上，中国的外交版图上从未出现过诸如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家的名字。在西方逐渐形成近代外交体系的时候，中国还是顽固地坚守着传统的朝贡体系。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西方近代外交体系正式形成，并确立了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家关系准则。而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处于宗主国地位，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家则处于附属国地位。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同，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地位不平等，中国始终认为本身乃天朝上国，甚至认为自身即天下，同时由于在东亚地区处于霸主地位，周边国家各方面皆不能成为对等的对手，因此中国自上而下皆对外国皆采取轻蔑态度，这种心态从“夷狄”这一称呼就可见一斑。正是由此，乾隆时中英第一次正式交往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便不欢而散。

不得不承认，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本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了解近代西方世界的大好机会，使团来华的目的有二，一为寻求贸易，二是炫耀工业革命的成果。因此，在带给大清皇帝的礼物之中有当时在西方最为先进的枪炮和精密仪器。然而，这些礼物甚至连包装都没打开就被乾隆皇帝一句我中华地大物博，除钟表外，无需外夷事物而打发进了圆明园的仓库。

礼物的命运英国人并不关心，但开放贸易却是他们不惜发动战争也要进行的，因为这个时期的英国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

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成为西方世界发展的领头羊，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英国成为最强势的开拓世界市场、占领殖民地的国家。随着美国、法

国、德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英国资本主义对它们的优势逐渐缩小，更多商人热衷于投资海外，于是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成为英国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的海外扩张特别是武力扩张逐渐增加。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国家，英国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英国的到来本已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威胁，近邻日本的崛起又给中国埋下了深重的危机。本来，中日之间的交往向来以中国居主导地位而进行，学者在描述中日交往时多以学生和先生比喻两者的关系。日本善于学习和模仿，他们从中国吸取了多种文化技艺并充分利用其自身注重细节的职人精神加以提炼和改造，中国对此一直没有给予充分之重视，毕竟细节问题不是重“意”的中国人所认可的，而匠人也好职人也罢都不是艺术家。日本近代的开端也并不愉快，他们从1854年开始，便被迫与美、英、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日本很快便开始了“明治维新”转而全面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傲立亚洲的一个新兴列强。日本维新运动并不彻底，加上资源稀缺等问题，导致对外扩张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国策，甚至军国主义也在此时逐渐形成和发展。于是，中国在成为西方列强的瓜分目标之后，继又成为东方新秀的猎物。

甲午战争是日本参与瓜分中国的一次成功尝试。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不说，连陆地上的战斗也大败亏输，几十万湘军出关作战，竟然连一次“像样”的败仗都没有便无声无息地溃退了。于是，中日两国皆举国震惊。中国震惊于学生把老师打败得如此之惨；日本震惊于中国沦落到如此之弱，而全面侵华战争的根子在这时就埋下了。

仓促地激进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谈及中国时说道：“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上看，这句话是没有错的。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众多以前从未发生的“进步”。只是，这些“进步”

多是国人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时仓促应对而产生，又由于我们在面对西方时，总是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所以阅读晚清以降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总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随着当时的有识之士逐渐开眼看世界，他们发现中国似乎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上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中国的变革便一次比一次步子迈得大，一次比一次间隔的时间短。在遭遇近代的16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经历了多样的持续的动荡与变革，以及不断的革命和激烈的整合。著名学者余英时甚至认为从鸦片战争以后，从太平天国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现状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存在，甚至都无法区分何为保守何为激进。由此可见中国变化之仓促与剧烈。

中国的第一次改变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认识世界和学习技术上。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让国人见识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于是逐渐产生了认识和了解西方的意识，林则徐、魏源等首先意识到西方人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夷狄”不同，他们搜集了关于西方的相关资料并集结成书，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后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正是林、魏等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这一次的改变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并未触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传统，对思想文化方面也几乎没有涉及。

第二次的改变便激进了很多。这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的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势也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于是康有为首先从传统伦理入手进行改造，他写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将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所谓儒家经典统统斥为伪书，将孔子从至圣先师改造成改革家，并将西方制度引入自己的学说，作为向西方学习、变中国成法的依据。这一次是对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虽然名义上保留皇帝，但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西方政体。此后的历次变革，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遵循着一次比一次激进的规律。

之所以说这种变革是仓促的，是因为中国人的心态出了问题。有学者将国人对近代史的心态戏称为“三妇心态”：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

心态，虽不严谨但符合事实。这三种心态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而正是由于心态的不正常，才使得变革如此的激进而仓促。

变革的仓促主要体现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如上所述，中国传统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留在中国，留在中国人身上的烙印至深且巨，因此在面临西方异质文明时，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形成一种适应中国人的现代文明，便成为一个 important 问题。比如，西方为商业文明，现代西方的基本理念基本都由此而来，商业文明重利轻义，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多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而中国为农业文明，讲究重义轻利，人与人之间重感情，人与国家之间则为从属关系，这一问题如何解决？西方重个体，个人的平等自由和个人利益被置于首位，但中国重等级，每个个人都被安排在一个等级鲜明的群体之中，天地君亲师都被排在个人之前，个人的利益在君主面前甚至在父母面前都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西方重开拓与冒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线，西方贵族子弟到各地开拓市场等行为都是这种开拓与冒险的表现，而中国人安土重迁，除非遇到天灾人祸否则故土难离，西方政府鼓励变革而中国君主追求稳定。这些都是西方与中国的重大区别。如果当时中国人能仔细考虑这些差别，再寻求变革之道则可能像日本一样走上崛起之路，但我们要么是以中学为体，丝毫不可改变，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可谓是“私人拖住了活人”；要么是将传统文化作为进步的羁绊全部扫去，发展到最后甚至连汉字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而要以西式的拼音文字取代。这种情况，除了中国人追求进步的心情过于迫切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切向前看

历史上，中国传统士大夫们总是秉持着一个理念，即凡古皆好。他们认为上古三皇五帝时乃黄金时代，将上古社会描绘成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